



国会议员与民国宪政 (1916~1923)

——以吴景濂的政治活动为中心

张淑娟◎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国会议员与民国宪政

(1916~1923)

——以吴景濂的政治活动为中心

张淑娟◎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会议员与民国宪政 (1916~1923) / 张淑娟著.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620-4957-9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1916~1923 IV. ①D69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3483号

- 书 名 国会议员与民国宪政 (1916~1923)
Guohui Yiyuan yu Min'guo Xianzheng (1916~1923)
-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8908325 (发行部) 58908334 (邮购部)
- 编辑统筹 第三编辑部 010-58908289 zonghebianjishi@gmail.com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 规 格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6.875 印张 160 千字
- 版 本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20-4957-9/D · 4917
- 定 价 22.00 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国会议员与民国宪政（1916～1923）

——以吴景濂的政治活动为中心

内容摘要

吴景濂等国会议员的政治活动与民国宪政的关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二次革命之前的国会初开阶段，二是1916年国会第一次恢复阶段，三是护法国会阶段，四是1922年国会第二次恢复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正式国会运转的初始，政党的组织和活动基本仿照西式宪政的政治规则进行，国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议员以制宪和稳定政府为主要政治目标，尽管也有政见的分歧，但并未因之产生大的内讧，干扰主要来自袁世凯等国会外力。此阶段的政治基本在宪政轨道之内。在第二、第三个阶段，由梁启超、汤化龙领导的研究系创造出来的反“帝制”话语冲击了第一次恢复的宪政文化，宪政格局的建立发生偏转，充满浓厚的“成王败寇”色彩，开启以“功绩”而非专业化知识为标准组织政府的恶例。这种冲击对国会造成的最坏

影响，就是政党不再努力以政纲争宪政位置，而转向以寻求武人支持为谋求党派利益的主要方向，形成了文、武交叉结合的宪政组织格局。它打破了国会的整体协作精神，并导致正式宪法产出困难。这一格局延续到护法时期，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武人势力和政党人员组成。如此，国会、政府、政党的界限变得模糊，议员的小集团和不同武人的利益同盟成为宪政的核心。从全国来看，宪政呈现出议员分裂、政府远离国会、各方另造宪政组织的状态，进而产生合法性的争吵。到第四个阶段，以上负面影响发展到极致，宪政中已看不到国家、法律，唯有不断变换的利益，由此而激发的政潮自然无法休止，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民初宪政的试验被终结，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其中包括宪法危机、文武结合的宪政结构以及传统文化思想的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包括袁世凯、北洋系武人、南方实力派，还包括议员、党派、革命家，而西方宪政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则穿插在其中，对抗或融合，交相为用。因此，单纯的宪政模式或议员道德、传统文化的影响，都不能被简单地认做宪政试验在民国结束的原因。



内容摘要	1
导 言	1
第一章 再任议长：北京，1916 ~ 1917	12
第一节 1916 年的政治氛围与吴景濂的资历	12
第二节 宪政重建与危机：吴景濂的选择与 努力	26
第二章 护法议长：广州，1917 ~ 1920	47
第一节 军政府的创建与改组	47
第二节 吴景濂的护法网络与政治对手	63
第三节 1919 年南北议和	75

第四节	制宪与分裂：和谈中断后的局势	96
第三章	“流亡”议长：上海，1920～1922	103
第一节	护法之余波	103
第二节	“议长”之尴尬身份与生活	111
第三节	新的转机	122
第四章	主持贿选：北京，1922～1923	126
第一节	益友社的北上与法统重光	126
第二节	吴景濂的关系网络新变动	141
第三节	吴景濂的政治目标与内阁风潮	149
第四节	癸亥政变与曹锟贿选	161
结 论		182
附 录	吴景濂大事年表	192
参考文献		199
后 记		214

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国初期政治史的研究中，1916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界标。在这一年，“帝制自为”而未能遂愿的袁世凯病逝，从此北洋失去了一个统摄的中心，各系分立，互不统属，而国家政治亦陷入更为纷繁复杂的状态之中。虽然关于军阀政治的历史分期存在着许多分歧，多数人仍倾向于把1916年作为军阀时代的起始点，从这一年至1927年之间的这一阶段，一般被认为是狭义上的军阀兴盛时期。著名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即把1916年至1928年之间的民国时代明确地称作“军阀时代”^{〔1〕}；国内多种版本的《中华民国史》在容纳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也表示认同。^{〔2〕}

虽然在整体上这段时期的研究仍比较薄弱，但相对而言，军阀方面的研究成果稍多。除了早期对军阀的定义、阶级性质、

〔1〕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目录第3页。

〔2〕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新：《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出版最晚近的这本虽然在导言中提出要突破以往的通史写法，“将中华民国史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甚至与中国现代史的体系和分期区别开来”，但对于“军阀政治”（第四章）的起点安排显然与旧版本并无二致。

社会作用等讨论的文章外，对北洋系袁世凯及其之后的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等都有研究专著；西南军阀方面，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四川、贵州、西北等地的军阀也或多或少受到关注。^{〔1〕}这些成果使人们对1916年到1927年间军阀统治的状况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军阀派系的结构也作为主导性社会结构被接受下来。然而一旦“军阀”成为一个叙述主体，“军阀”的反动、破坏性，及其造成的社会失序、民不聊生一再受到强调和渲染，尽管各个研究在视角上各有不同，却“很难找到一个为军阀时期说句好话的人”，^{〔2〕}北洋时期中国社会的停滞乃至倒退几乎成为共识，及至后来，经济和外交领域的研究进展开始对此提出异议，^{〔3〕}局面似稍有改观，但并不能撼动武人的绝对性地位与作用。^{〔4〕}在同类文字的重复作用下，“军阀”的能量无限膨胀。

孙中山及以其为中心话语的“革命史”研究，一直作为军

〔1〕 如 Ch'en Jerome, *Yuan Shih - K' ai, 1859 ~ 1916*, London: Allen Unwin, 1961. Wou, Odoric Y. K.,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 ei - Fu, 1916 ~ 1939*, Folkestone: Dawson, 1978. 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其他概况请参照来新夏、莫建来：“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胡平生：《中国现代史书籍论文资料举要》（二），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2〕 Diana Lary, “Warlord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 6, No. 4, October, 1980, p. 441.

〔3〕 参见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17页；金光耀、郭秋香：“‘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在后来的一本专著中从另一角度对这一观点做了验证，见 *Warlord Soldier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阀政治的对立面，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受“革命史观”的影响，^{〔1〕}自辛亥革命至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一直作为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方向在研究中被追溯着，革命的轨迹愈来愈清晰，“革命”的热潮似乎也从学术研究蔓延到民国的实际政治之中。然而，“革命”在当时的语境之下是否曾得到全国性的拥护姑且不论，当诸多的材料只因孙中山的活动而获得意义的时候，民国的历史就大大地被简化了，更多面的历史被笼罩在“大革命”语境之下。

军阀和“大革命”的简单组合不是这段政治史的全部，1916年到1923年国会一直断断续续贯穿其中，但一方面因为史料的限制，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上述两大叙述模式，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军阀的作用、革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提前和夸大了，国会的角色随之被缩小，仅仅成为北洋政府的一个“招牌”，但“为什么北洋军阀不依仗他们的枪杆子干脆废除这种形式”这样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国会议员的活动轨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梳理。

吴景濂，字莲伯，号述唐，1873年生于奉天宁远（今辽宁兴城），早年接受传统教育，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接触西式课程，毕业后任奉天师范学堂监督，曾赴日本考察，后曾任奉天自治会会长，奉天教育会会长，奉天谘议局议长等职。民国成立后当选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在民国初期政治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吴景濂的政治活动，不仅可以对

〔1〕 有关革命话语的起源与形成，可参照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1页。

〔2〕 汪朝光：“五十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916年后的国会活动（这里倾向于运转方式）作一个纵向的考察，而且因吴景濂的政治身份是议员或议长，又跟军阀、革命元勋孙中山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有过多种合作，故面可以从另一侧面体现这段历史的多面样态，以及1916到1923年间民国政治社会的变迁。

与此相关的论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1916年之后上层政治文化是怎样的？在何种语境之下，吴景濂选择做一个议员、议长？作为一个议长，吴景濂通过什么方式来保有这一身份，参与国会运作？在军阀派系体制之下，以吴景濂为代表的政客们怎样维持国会的作用，又产生了什么后果？对孙中山这样的“真共和”者，吴景濂领导的益友社一系党派是什么态度？这种态度又将怎样影响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19年南北和谈，吴景濂及益友社的立场如何，南北代表在许多军事外交问题上已经达成基本协议之后，为什么最终破裂了？当五四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会议长吴景濂持何态度？他对于1920年左右的联省自治思潮有何反应？1922年国会第二次恢复之后，吴景濂面对组织性大大退化的政党和派别意见分歧的军阀，采取了什么政治策略实现其组织内阁的欲望？贿选是否是导致吴景濂和议会政治消亡的主要原因？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探讨1916年后民国政治的结构，以及国会、议长的角色与作用，从而扩展对这段时期历史的认知。

二、文献回顾

关于吴景濂个人的研究很少，就笔者所见，仅有吴叔班的“吴景濂与制宪运动”（《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3期），张树勇的“吴景濂与护法运动”（《南开史学》1985年第1期），专著仅有台湾管美蓉著《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下简称“管著”）一部。

前两篇文章主要就吴氏政治活动进行了简单的描述与分析，虽属于破冰之作，但分析不够深入。管著原是一篇硕士论文，且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尚未出版、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完成，实在难能可贵。该著以“吴氏个人政治地位的转变正与国会的兴衰相契合”，故把目标设定在探求“军阀政治时期国会所代表的意义”上，进而求得“民初民主政治试验失败的原因”。^{〔1〕}在行文上不再单一地站在孙中山的立场上，力图挣脱“革命史观”的影响。如关于护法军政府的改组，管著指出，孙中山因欲图维护其个人的大元帅地位，而“使护法政权受到实力派武人之孤立”，护法事业不能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南下的国会议员为实现护法，便必须争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因此军政府的改组不可避免。

然而，在吴景濂行为变化的解释上，管著运用了许多价值判断的词句。价值判断使得研究者总要选取一个立场，并赋予其正义性，“民意”、“民族主义”总是为这种立场辩护的有力武器。如管著认为，护法国会“形成民国法统的象征，使国人有一真正民意机关的印象”，^{〔2〕}且不说北方的报纸对于南方护法国会的观感是否与此相同，但只讲这种“国人的印象”，是如何得知的呢，如果来自于报纸或民间的调查，那么报纸的背景和民间的地域观念等都是需要列入考虑范围之内的因素。“时势”与“民意”，作为非实体的存在，具有人人持有而人人有理的特点。在民初，“民意”、“爱国”、“法统”等词就像漂亮的标签一样，最邀各方的垂青。无论北方抑或南方，文人抑或武

〔1〕（台）管美蓉：《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绪论。

〔2〕（台）管美蓉：《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第248页。

人，均争相抢夺之。^{〔1〕} 故仅从理论上判断民意属于国会，只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如何尚有待深究。因此，笔者以为，价值观的指导固然重要，但如若能够尽力避免先入为主的意见，从历史的“当下”情境出发，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关于议会政治的研究相对较多，大多集中于袁世凯死前的第一届国会（一期常会）时期。1949年前有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书局1914年版），佐藤三郎、井上一叶的《民国之精华》（北京写真通讯社1916年版），哈罗德（V. Vinacke Harold）的《中国现代宪政的发展》（*Moder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0）等。1949年后专著有李守孔的《民初之国会》（正中书局1977年版），台湾胡象贤的《民初国会之渊源与演进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研究》（学海出版社1983年版），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国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4年第13期〕及《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李学智的《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与法制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文章约100多篇，但仍多集中于临时约法与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常会（袁世凯在位时）时期。^{〔2〕}

把1916年后的国会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则较少，刘楚湘的《癸亥政变》（上海泰东书局1924年版）及方惠芳的《曹锟贿选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3年版〕均为研究曹锟贿选的专著。顾敦铄《中国议会史》（苏州木渎心正堂1931年版）和管美蓉的《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

〔1〕 罗志田：《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72页。

〔2〕 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历年公布的国内外文章。

1995年版)则从民国初元写到国会终结,没有关切1916年前后的区别。文章有张朋园的“安福国会的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第35期),杨天宏的“走向衰亡的民初国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以及李学智的“第一届国会的最后一幕”(《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等。以立法、宪政历程作为视角的专著也有部分涉及,如台湾吴宗慈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文海出版社影印版),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政治:1918~1923》(Andrew J.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耿云志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等。

造成这一局面,一方面因为对1916年后军阀体制和革命氛围的过分关注,在无意识中使人们轻视了国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民初颇有现代政党风气的国民、进步两大党在护国战争后日益四分五裂,良性的政党竞争竟渐沦落为“乡愿”诟骂,甚至大打出手,这样的堕落不但使后来者对其政党身份不能认同,并在无形中消解了国会的整体威权,使其作为国家的民主象征在形象上大受折损,从而与1916年前的民国截然有别。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中亦认为,第一届国会中的党争虽有诸多可议之处,却“还有受责备的价值”,而1916年后的政党则完全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了。谢彬的《民国政党史》(学术研究总会1926年版)及杨幼炯的《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对政党的分化作了较详细的统计。故此,虽然军阀们并没有放下民主这面大旗,但国会已经被看成军阀政治的一个装饰品,受到的关注有限。

三、史料及思路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较为广泛的史料基础之上,其中主体资

料是1996年天津历史博物馆出版的《北洋军阀史料》丛书中的三个卷宗。该丛书分《袁世凯卷》、《黎元洪卷》、《徐世昌卷》、《吴景濂卷》，共33册，包括家书、文稿、批示、圈阅文件或与他们相关的函电、呈单、报告等公私手写文件。文件内容涉及到政界要人、军事统领、社会名流以及自称民众之知识分子各色人等。因卷主均是当时最高决策者，且资料具有机密度高、内容翔实、鲜为人知的特点，因此对推进军阀时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吴景濂卷》更直接关涉到吴景濂本人，分国会、参众两院财务与会务、局势（上、下）、第二次南北议和、罗文干案和曹锟贿选、经济、综合等8个分册，时间段集中在1916年到1926年之间，是研究这段时期内国会角色、政治局势不可或缺的资料，也是本书的核心资料。而且，因为对这段历史中国会的关注度不够，到现在为止，还没见到其他学者系统地利用过这个卷宗。

当然，对具体历史时段、事件的研究还需要其他档案资料的补充，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国会、步军统领衙门、筹备国会事务局、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总统府军事处等部门的档案是本书利用的重点，其中有一些国会内提案、质问案及部分会议速记录，都是弥足珍贵的原始材料，而一些政府方面的报告与分析则能够从另一角度考察政治的发展，另外还有天津市档案馆的部分资料，一定程度上降低论断的偏颇。

广东省档案馆已出版的《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藏海关档案选译》，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对护法政府持有的观点，有利于作更客观的评述。黄季陆主编的《革命文献》第47、49～51辑，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编的《国父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孙中山全集》可以很好地诠释孙中山党派的努

力。《近代史资料》总第 106、107 册中的“吴景濂自述年谱”（上、下）是对吴景濂个人立场的补充，而总第 36、51、56、67、69、76、87 册中的相关资料也是对不同事件的佐证。

鉴于民国初期的报纸言论自由度比较大，且因为党派的对立关系，很多不为人知的机密信息会经过政敌揭露出来。当然，这也有夸大或造谣的可能，在引用的时候，需要经过多家报纸或立场中立的报纸作参证。本书引用的报纸主要有《申报》、《民国日报》、《盛京时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等。由于第一章在主体资料《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中无法得到足够的证据，因此较多地使用了报纸资料。

与 1916 年后的国会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精英的思想论述，或制宪、立法等活动，及对已形成文本的制度缺陷的解读，而于其背后的运作过程、政治结构关注相对有限。如果可以把历史本身比作一场火的话，那么活动轨迹和文本可以比为燃烧后的灰烬、残渣，而历史的运作则可视作燃烧过程；或者把历史本身比作一场生产，那么活动轨迹相当于制成品，而历史的运作则可视作制作过程。如果我们要了解事物的本质特性，无论灰烬、残渣还是制成品，给我们提供的线索都是相对有限的，而过程却能给我们展现出多方面的因素和特征。

为了更接近这样的方向，对吴景濂社会网络的挖掘与梳理将是本书的重要部分，网络分析主要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现象，对于利用阶级意识、政党归属、性别、年龄等属性特征来解释人们行动的传统研究方法是一种补充，^{〔1〕}可以揭示社会系统中不同层次的结构。事实上，在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网络观点不仅应被视作一种有效的手法，亦可成为研

〔1〕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25 页。